

式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在国际大变局下,中国要跳出传统“三角关系”的思维框架,需要充分运用自身的实力、影响和智慧,主动引导和塑造中美、中俄关系的发展,努力实现中美俄关系的良性互动。

【责任编辑:张志洲】

## 改革开放以来中日关系的历史反思

吕耀东

【作者简介】 吕耀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邮编:100732)

【DOI】 10.13549/j.cnki.cn11-3959/d.2019.02.004

【中图分类号】 D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55(2019)02-0019-08

对日关系在中国对外关系中居于重要的地位,这不仅是因为日本是中国的近邻和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更是因为两国关系之非同一般。近代,日本作为先行现代化的国家,实行对外扩张,侵略中国。日本战败后,在冷战中作为美国的盟国与新生的中国对立。中美建交后,中日才实现邦交正常化。改革开放后,发展与日本的关系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中一直处于重要地位。特别是日本作为发达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着特殊的重要性,日本是中国引进外资和发展加工出口产业的重要依托。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及领土争端和战略利益差别,中日关系的发展受到制约。特别是在中国综合实力迅速提升的情况下,日本对中国的战略警惕和利益竞争增强,日本政府加强了与美国的同盟合作,试图对中国进行遏制,在此情况下,中日关系止步不前,甚至出现后退。

回顾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日关系的发展,总的来说是从走向正常化到不断扩大与深化,从双边走向地区与国际的过程,由此,两国间的共同利益大大增加,但是出于

复杂的原因,两国关系的发展并不顺畅,随着利益交织的加深和力量对比的转变,深层次的矛盾凸显。

展望未来,面对两国综合实力对比的重大转变,即中国越来越远超日本,两国间的关系将会出现不平衡结构下的重大调整。在这个进程中,如何把握中日关系稳定、和平转变的大局,构建新力量结构下的新合作关系,共同推动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不仅需要中国、同时也需要日本更新观念,趋利避害,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

### 一、中日关系的阶段性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中日关系经历了 20 世纪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的平稳发展阶段,20 世纪 90 年代的曲折发展阶段和 21 世纪的反思与调控阶段。

#### (一) 中日缔结和平条约后的平稳发展

冷战后期,中日两国对双边关系和东北亚安全局势做出研判后,于 1978 年 8 月 12 日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为中日建立新型友好合作关系起了定向作用。以 1978 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时代。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发展的现实出发,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中国的外交政策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进行了重大调整。邓小平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得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的结论。这一外交政策的重要调整适应了时代的发展要求,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加大了中国的对外开放、对外交流的范围和力度。

1978 年 10 月 23 日正式生效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使得中日两国和平共处、世代友好的大方向第一次以法律形式确立下来,让 1972 年《中日联合声明》所规定的两国关系准则以条约的形式得到了体现和发展,开辟了中日两国合作的新时期,进一步确定中日友好合作的大方向。从此,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的交流更加广泛地展开。同时,这一条约的缔结,对维护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产生了积极影响。

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使得中日两国良性互动频繁,特别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为中日两国在政治、经济、环境、技术、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合作奠定了基调和原则。《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无论对中国还是日本来说,无疑都是一个新的起点。《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生效,推动了中日友好合作事业的发展。两国领导人频频互访,出现了官民并举、相辅相成、形式多样、内容广泛的新局面。特别是中日双方决定召开高级官员定期协商会议,这是中日友好合作关系史上的一个创举。中日

和平友好条约生效后,两国领导人互访频繁。

## (二) 冷战后中日关系的曲折发展

20 世纪 90 年代冷战结束后,当年促进中日复交的国际环境不再,双边关系动能减弱,曾被搁置的双边矛盾开始重新显现和激化。中日政治关系出现起伏不定、曲折多变的现象。

1992 年,尽管江泽民总书记和日本天皇实现了互访,但也未从根本上消除中日关系因“历史问题”产生的阴影。1995 年,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50 周年之际,日本部分政要、右翼势力不但不反省历史,反而肆无忌惮地否认和美化侵略战争。虽然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发表了“反省历史,巩固和平”的“8.15 讲话”。然而,1996 年的《日美安全联合宣言》显示,日美将致力于强化控制和干预东亚安全局势的军事同盟体制。这些动向严重恶化了中日政治和安全互信,动摇了 1972 年以来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

1998 年 11 月 25 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问日本,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双方在回顾、总结、评价中日关系的发展状况后,发表了《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两国政府还签署了《中日关于进一步发展青少年交流的框架合作计划》、《中日面向 21 世纪的环境合作的联合公报》以及《中日关于在科学与产业技术领域开展交流与合作的协定》。其中,首次确认中日关系是“对两国均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并宣布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

在《中日联合宣言》中,中日“双方认为,正视过去以及正确认识历史,是发展中日关系的重要基础。日方表示,遵守 1972 年的中日联合声明和 1995 年 8 月 15 日内阁总理大臣的谈话,痛感由于过去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和损害的责任,对此表示深刻反省。中方希望日本汲取历史教训,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在此基础上,两国发展长久友好关系”。<sup>①</sup>“日方继续遵守日本在中日联合声明中表明的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重申中国只有一个。日本将继续只同台湾维持民间和地区性往来”。<sup>②</sup>上述内容是日方在二战后对于侵华历史责任最为深刻的反省,也是日方在台湾问题上对于“一个中国”最为明确的表达和承诺。

《中日联合宣言》强调,中日双方将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最大限度地扩大共同利益,缩小分歧,通过友好协商,妥善处理两国间现存的和今后可能出现的问题、分

<sup>①</sup> 《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 <http://www.china-embassy.or.jp/chn/zrgx/zywj/t62644.htm>, 访问日期:2018 年 12 月 3 日。

<sup>②</sup> 《江泽民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245—246 页。

歧和争议,避免因此干扰和阻碍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双方充分认识到,中日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不仅需要两国政府,而且需要两国人民的广泛参与和不懈努力。<sup>①</sup> 这为 21 世纪中日友好合作关系确立了行动指南。

### (三) 进入 21 世纪中日关系的调整阶段

进入 21 世纪初期,中日两国战略分歧日益增强,两国关系前景充满不确定性。小泉纯一郎首相屡屡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严重破坏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小泉内阁对 1972 年以来历届内阁对华政策进行了颠覆性破坏,首相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及历史教科书等问题导致中日双边互动停滞不前。

针对中日两国出现严重的“政冷”局面,2007 年和 2008 年,福田康夫首相与胡锦涛主席实现互访,确立了中日第四个政治文件——《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双方就中日关系是各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达成了共识。两国决心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实现两国的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和共同发展的崇高目标。双方确认,将继续恪守《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日联合宣言》等各项原则,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今后不断加深相互理解,构筑相互信赖关系,扩大合作,创造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的美好未来。中日“双方相互视为合作伙伴,不是威胁。”<sup>②</sup>

然而,2012 年日本政府非法将钓鱼岛“国有化”后,中日关系的脆弱性再次显现,加之安倍晋三首相再次参拜靖国神社等历史修正主义言行,严重破坏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两国首脑互访再次断绝。中国从地区和平稳定的大局出发,努力缓和中日关系。通过 APEC 会议、亚非首脑会议、中日韩首脑会谈和 10+3 首脑会议等一系列多边场合努力化解中日矛盾。中日两国力求在构建战略互惠关系方面扩大共识和合作领域,渐进地缓和与推动中日双边关系。2014 年 11 月 7 日,中日通过《四点原则共识》逐步重启政治、外交和安全对话,努力构建政治互信。2018 年,中日两国政府首脑实行互访,两国关系重回正常轨道。

总体上来讲,日本仍表示将坚持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大局,从目前局面看,中日双边互动已进入一个新的战略调控期。鉴于日本政府仍然有继续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意愿,中国政府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大局角度缓和中日关系,并在日方承诺坚持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的前提下,达成中日“四点原则共识”,双方同意利用各种多边和双边渠道重启政治、外交和安全对话,努力构建政治互信。

<sup>①</sup> 李建民:《冷战后的中日关系史(1989—2006)》,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 年,第 198 页。

<sup>②</sup> 《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人民网,2008 年 5 月 7 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72122234.html>,访问日期:2018 年 12 月 10 日。

## 二、中日关系结构性特征与双边政策调控的必要性

随着中日相互依存程度的深化,也形成两国的战略竞争的微妙变化,导致双方在政治和安全层面的摩擦时有发生,未来中日关系还有可能会因为双方的结构性矛盾而恶化。正是基于化解矛盾的可能性,中日积极探索两国未来的双边关系的定位,避免因历史、台湾、领土及海洋权益等因素形成的摩擦和冲突,降低中日及亚太地区政治与安全的不稳定风险。

### (一) 中日关系的结构性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中日关系从经济的层面讲两国之间互补性强,相互依存日益增强。尽管日本依靠对华贸易支撑经济的局面日益明显,但在日本某些保守政治势力看来,中国国力的增长已对其实力地位构成现实挑战,不利于日本政治大国目标的实现。对于他们来说,中日经济相互依存的方法可能给日本提供一个颇有前途的竞争者,也许还是一个战略竞争者。显然,中日两国潜在的战略冲突依然存在,同处东亚的中日之间的矛盾具有结构性特征。

中日在冷战后期“相互依存”掩盖下的历史、台湾、钓鱼岛领土主权及东海海洋权益等“敏感性”问题浮出水面,两国政策互动中的摩擦和冲突不断出现。比如,日本政府在“东海海洋权益问题”上采取的对华强硬政策,同时触及敏感的“钓鱼岛领土主权问题”,这是以破坏东北亚区域安全为代价的,表现出了中日“脆弱性相互依赖”的负面效应。日方严重背离了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动摇了中日政治互信的基础。可以说,日本多次在对华政策上的倒退,都是以破坏中日和平友好为代价的。这种做法破坏了中日双边政策互动的良性机制,导致中日两国的摩擦和冲突不断增加,加重了两国关系的“脆弱性”。

### (二) 中日双边政策调控的必要性

在双边互动过程中,一国对外政策的变动可能引起另一国的“敏感性”反应,并可能因此付出代价或造成损失,这种“脆弱性”只能在双边政策良性互动过程中得以化解。

中日复交是两国在国家安全战略和发展利益上互利合作的产物。这种基于合作之上的互动,促进了两国相互依存程度的不断深化。中日相互依存深化到一定程度而触及“敏感问题”和民族感情时,摩擦和冲突就在所难免。从这一现实出发,未来中日双边互动的情境可能出现“和则两利,斗则两伤”、“和而不同”等种种情境。这种种情境是主客观之间的可能性判断,中日总是处于直接面对这样情境的相互影响之中。为了尽量争取“和”、避免“斗”,中日两国应通过积极的双边互动及“政策调

控”，维护中日关系。

首先，应维护和发扬中日经济关系互动的“稳定性”。中日综合国力变化引发新的矛盾和摩擦，并未改变双方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客观事实。21世纪初期，中日经济关系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中日两国互为重要的合作伙伴。近来，中日两国在经济层面的合作保持良性互动关系。这种现实多少缓解了日本社会对于中国“崛起”的过度敏感心理。只要两国能够抱着战略互惠的诚意，目前的摩擦和矛盾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中日相互依存的发展态势。

其次，应充分认识中日关系“不确定性”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致力于通过建立双边良性互动的渠道，逐步化解中日外交困境。中国和平崛起和日本的政治大国战略在时间上的重叠和内容上的分歧使两国的战略定位发生强烈碰撞。<sup>①</sup>中日关系的“不确定性”是客观存在的，是由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因素所决定的。因而某一方不合时宜地追求“政热”，往往事倍功半，因为双边关系不是以单边的主观意志决定的。况且“经热”并不能必然带来政治关系和谐。不同历史时期，两国相互合作和依存的内涵不同，但中日相互依存的形式并没有变化。中日可以通过广泛的经济合作来防止两国关系恶化的可能，以双边政策良性互动的形式解决彼此的分歧与矛盾。

再次，中日两国相互依存的发展是双边互动的结果。一般来讲，“相互依存的水平越高，相互作用的力量越大”。<sup>②</sup>日本有识之士曾指出：“占世界经济百分之十以上的日本面对日趋相互依存的世界，如果不努力使国际环境向着协调方向发展，促进本国的安全保障是不可能的。”<sup>③</sup>有的学者认为“日中关系的恶化，不仅不利于日本，同时也不利于中国”，<sup>④</sup>开始接受中日相互依存日益深化的现实。所以，日本必须放弃把中日相互依存的非对称性固定化的心态，促进中日双边互动的均衡、良性发展。顺应全球化的发展，适应相互依存的现实，与中国等周边国家和平相处，共图发展，应该是日本的最佳战略选择。

改革开放40年来，日本在历史、台湾、钓鱼岛领土主权及东海海洋权益等敏感性问题上的某些举动，有违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精神，常常导致中日关系陷入“不确

---

① 仇华飞：《当代国际体系转变中的中国对外战略》，《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② [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邵文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第148页。

③ [日]佐藤英夫：《对外政策》，王晓宾译，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9年，第167页。

④ [日]五百旗头真：《战后日本外交史（1945—2005）》，吴万虹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第19页。

定性”的怪圈。所以,日本回到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精神上来,是两国关系减少“政冷”、实现双边良性互动的基础条件。就中国而言,要向国内外阐明中日相互依存的“互补性”和两国合作的“战略互惠性”,进一步表明中国“和平与发展”的战略理念,促进中日相互依存的良性发展,在推动中日关系方面掌握主动权。总之,随着中日相互依存程度的深化,“继往开来”将成为中日两国双边互动的总体向度。

### 三、中日关系的缓和及走向

中日双方均视两国关系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四点原则共识”的引领下,目前两国在经济、文化、人员往来等领域的关系有了一定发展。但中日关系仍然处在一个关键时期。如何把握机遇,有效化解两国战略分歧,寻求共同利益,保持双边良性互动的持续性,还需要两国不断推动中日关系的向前发展。

中国一贯维护中日关系大局,坚持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发展双边关系。中方本着努力扩大两国关系积极面,抑制消极面,确保两国关系稳定改善的态度,<sup>①</sup>明确指出中日关系存在的问题和努力缓和双边关系的建设性意向,希望日方能够拿出实际行动,全面落实中日“四点原则共识”,诚心诚意发展双边关系。2018年5月4日,习近平主席应约同安倍首相通电话时指出,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中日关系处在承前启后的重要节点。双方要重温和平友好条约精神,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各项原则,落实四点原则共识,信守承诺,按规矩办事,管控好矛盾和分歧,确保中日关系重回正轨并得到新的发展。安倍表示,日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以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为契机,推动两国关系全面改善和发展。<sup>②</sup>

中方从中日关系大局出发,将缓和两国关系付诸实际行动。李克强总理于2018年5月8日至11日访日为中日关系重回正轨迈出关键一步。李克强在出席日本经济界等举行的欢迎活动时表示,中日两国是世界主要经济大国,有责任反对保护主义,维护自由贸易,强调两国应携手为世界经济发展作贡献。安倍首相回应称:“日中关系从竞争进入了协调时代。希望具体推进民间企业在亚洲的基建开发,愿推动

<sup>①</sup> 《习近平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web/wjdt\\_674879/gjldrhd\\_674881/t1394821.shtml](http://www.fmprc.gov.cn/web/wjdt_674879/gjldrhd_674881/t1394821.shtml),访问日期:2017年6月21日。

<sup>②</sup> 《习近平应约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通电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web/zyxw/t1556764.shtml>,访问日期:2018年5月6日。

日中关系进入新的阶段。”<sup>①</sup>

当然,中日关系业已存在的问题随时可能凸显和尖锐化,两国关系仍然存在反复的可能性。中日两国间依然存在不可预测的不确定性。为此,李克强总理访日期间强调:“我们要铭记历史,汲取深刻教训。以互信为本,悉心维护双方达成的共识,夯实政治基础。视对方发展为机遇,将互不构成威胁的理念转化为具体政策和行动,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努力实现两国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避免再出现大的波折和反复。”<sup>②</sup>

由上可见,坚持“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中日“四点原则共识”,是两国积极探讨未来双边关系定位的基础,可以避免因历史、领土、海洋权益等因素形成的中日在政治和安全层面的摩擦和冲突。目前日本对华政策存在着一定变数和不确定性。鉴于,日本政府仍主张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姿态,通过中日对话与磋商,缓和彼此分歧与矛盾,累积双边政治互信,不仅有利于中日关系的发展,而且有益于东亚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责任编辑:张志洲】

## 中非合作 40 年： 观察中国与外部世界变化的特殊窗口

刘鸿武

【作者简介】 刘鸿武,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院长、教授。(浙江金华 邮编:321004)

【DOI】 10.13549/j.cnki.cn11-3959/d.2019.02.005

【中图分类号】 D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55(2019)02-0026-05

---

① 《李克强呼吁日中两国携手反对保护主义》,日本共同社,2018年5月10日, <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18/05/1e017fc96b25.html>,访问日期:2018年5月12日。

② 《李克强在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 40 周年招待会上的演讲(全文)》,中国政府网, [http://www.gov.cn/premier/2018-05/11/content\\_5290000.htm](http://www.gov.cn/premier/2018-05/11/content_5290000.htm),访问日期:2018年5月16日。



## ABSTRACTS

### 3 Symposium: 40<sup>th</sup> Anniversary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and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by Ni Feng, Feng Zhongping, Feng Yujun,  
Lü Yaodong, Liu Hongwu, Jiang Shixue & Dai Changzheng

【Abstract】 2018 is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which is a milestone in China's foreign policy and its relations with the outside world. To mark the occasion, *International Forum* held a symposium on 8 October 2018 that featured keynotes by seasoned specialists reviewing China's major foreign relations during the past four decades. Ni Feng, deputy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of American Studies at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CASS), believes that Sino-US relations now is at a very difficult stage, and analyses lessons we could get from the last 40 years of Sino-US relations. Feng Zhongping, vice president of the China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elieves that although elements of competition may increase, cooperation remains the central theme in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 Feng Yujun,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Russian and Central Asian Studies and deputy dean of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t Fudan University, focuses on Sino-Russian relations and how to promote China-Russia-America relations in the new century. Lü Yaodong, director of the Department of the Japanese Diplomacy of the Institute of Japanese Studies at CASS, welcomes the recent developments in Sino-Japanese relations. Liu Hongwu,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of African Studies at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argues that the nature of Sino-African relations is different from that between the West and Africa, the bilateral relations offer a window to observe the changes in China and the whole world. Jiang Shixue, director of the Centre for Latin American Studies at Shanghai University, appreciates the role of Latin America in China's major country diplomacy in the new era, and offers his viewpoint on how to develop th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Finally, Dai Changzheng, Dean of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concisely summarizes the basic experience of China's diplomacy